

章汉夫文集

章汉夫文集



章 汉 夫 文 集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章 汉 夫 文 集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练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插页4 字数38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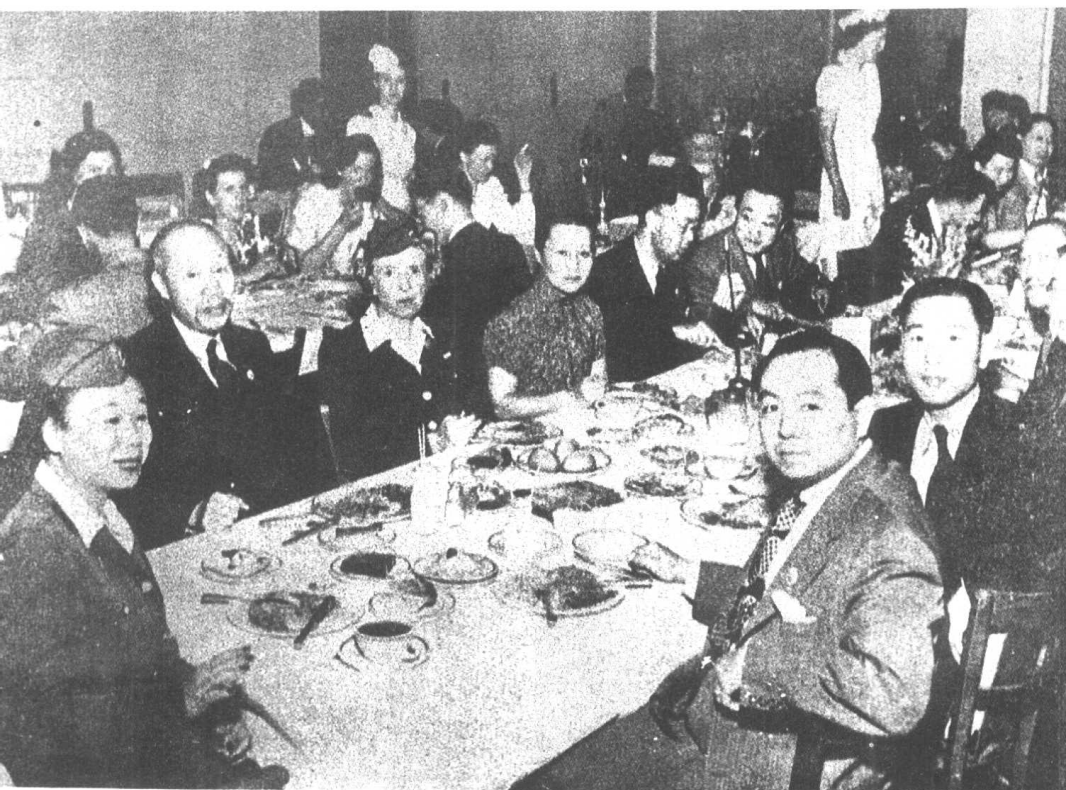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ISBN 7-214-00075-X

K·5 定价：(平) 3.60元
(精) 5.00元

责任编辑 张庆军



章汉夫同志在联合国成立大会招待宴会上。正后排：董必武（左一）、吴贻芳（左三）、章汉夫（左五）。





章汉夫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同新华日报负责人合影
章汉夫总编辑(左)、熊瑾玎经理(中)、潘梓年社长(右)



目 录

- 《章汉夫文集》代序夏 衍(1)
最艰难处显奇才
——忆章汉夫同志.....许涤新(7)
抚卷怀人感事
——乐观《章汉夫文集》编定朔 望(12)

一九三五年

- 谈新币制(15)

一九三六年

- 严重的私运问题.....(21)
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度报告书.....(26)
如何集中全国力量?.....(32)
教育的国防动员.....(37)
战士的锻炼.....(44)
联合战线论.....(48)

一九三七年

- 中国民族革命的首创者孙中山.....(72)

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	(79)
“生活不易”	(83)
中国与美国	(89)
美国的对华政策	(138)
现阶段的救亡运动	(172)
一年来对日外交的回顾	(185)

一九三八年

工农是抗战的柱石	(193)
救亡运动在商城	(193)
豫南剪辑	(201)
豫南救亡运动的几个问题	(206)
欧局焦点的捷克	(213)
武汉撤退到重庆	(217)
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226)

一九三九年

武汉在敌寇铁蹄下	(236)
团结抗战，力求进步，依靠群众！ ——评张君勱的意见	(242)
德国占领捷克全部后	(248)
日本无产阶级在斗争中	(258)
记者要努力理论学习	(263)
鲁迅先生的伟大思想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265)

一九四〇年

目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回忆)……………(273)

美日矛盾更尖锐了……………(278)

德国“和平攻势”失败了!……………(285)

●一九四一年

美国油往哪里流?……………(291)

美国工人为民主和平而斗争着……………(294)

辱骂鲁迅和鲁迅论辱骂……………(299)

论欧战发展及苏德关系……………(303)

抗议公开宣扬希特勒主义

——斥法西斯主义的“大地政治学”谬论…(311)

一九四二年

“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315)

印度国民大会……………(324)

谈“自己的文章”

——反党八股中的一点检讨……………(336)

苏联抗战一年

——斯大林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340)

美国的伟大传统……………(350)

论斯城保卫战

——从德军夏季攻势到苏军冬季反攻…… (354)

一九四三年

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 …… (365)

一九四四年

跟着正确的道路走 …… (373)

一九四六年

闲谈美国：“我是重庆来的” …… (373)

中国饭馆 …… (380)

纽约市选 …… (382)

《新华日报》在美国 …… (386)

报摊子 …… (388)

黑人歌王罗勃生 …… (390)

夜总会 …… (394)

贫民窟 …… (397)

专栏作家 …… (399)

“外国也有” …… (401)

恩派亚大厦 …… (403)

好莱坞 …… (405)

中国的“特种”输出 …… (409)

美国的特务	(411)
亨利·凯塞尔	(413)
美国对外政策的观察(专论)	(417)
孙夫人对时局的意见	(424)

一九四七年

看看蒋介石的后方	(426)
生存斗争的新浪潮	(432)
人民是压不住，杀不尽的！	(439)

一九四八年

论旧政协与新政协	(443)
历史的转折点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七周年	(449)
* * * * * *	
章汉夫同志文稿索引	(456)
编后记	刘光帜 (470)

《章汉夫文集》代序

夏 衍

一九八六年七月，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

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十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九二七年在美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之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日以继夜，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编选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的闻名

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八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芦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人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一九四二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五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

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例如三八妇女节那天报上登了一张邓颖超的照片，没有登孟庆澍的，王明就大发雷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象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九四三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的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任，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这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月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一九四六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十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经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今日中国》都已出版，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每期两三千字，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做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就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

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1986年10月

最艰难处显奇才

——忆章汉夫同志

许涤新

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而惨死狱中的章汉夫同志，离别人间，已经十四年了！

汉夫同志早年留学美国，目睹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制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二七年正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之际，汉夫在美国毅然加入共产党，次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并在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团中协助邓中夏同志工作。

一九三一年回国后，他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后又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告密，汉夫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峻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两年之后，由他的父亲谢仁冰设法保释出狱。出狱不久，他就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为了救亡抗日，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同时，还翻译出版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那期间，我正在苏州盘门外陆军监狱坐牢。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冬，难友们发动了一次罢饭斗争，要求：（一）开放书籍杂志；（二）不许看守随便打人；（三）改善伙食。经过三天的斗争，狱方只得答应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便能读到上